

文学与艺术

论新民歌运动的生成发展

李丽琴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新民歌运动,兴起于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期。它的发生与毛泽东个人有着直接的联系。它是由领导人毛泽东直接提倡、组织,各党政部门与文艺部门的紧密配合,文艺家、诗人、群众的集体创作三者的推动下生成发展壮大的。

[关键词] 大跃进;民歌;新民歌;采风运动;全民响应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53(2007)08—0216—02

随着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文化领域内也兴起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在当代文艺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这一跃进运动是由毛泽东直接提倡并大力推动、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全民性的文化实践。

一、毛泽东的提倡组织

毛泽东对民歌特殊的情感和政治经验是推动新民歌运动必然发生的潜在重要因素之一。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一些著名学者就提出了诗歌在本质上是平民的,要回到民间去吸取营养的主张。俞平伯在著名论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说:艺术本来是平民的,新诗不但材料须探取平民的生活,民间的传说、故事,并且风格也要是平民的好。深刻地影响了毛的诗歌观,并伴随了他一生的革命历程。

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休养期间组织农民运动,用当地的民歌民谣编写识字课本,开办夜校。1926年,在广州举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制定收集民歌这一内容。1929年,在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各级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1] 1933年,在江西瑞金搞社会调查时,有意识地收集民歌。1938年4月,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民歌中有许多好诗。号召作家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习他们的生活和生动新鲜的语言,丰富自己的创作,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指出文艺的两结合,再次号召作家到人民群众中去,创作出为他们喜爱的作品。1943年10月,延安诗界举办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创作“大众化”诗歌的主张。随后出现的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等作品,赢得了边区人民的喜爱,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后来他常常以此来印证这一诗歌发展方向的正确。

建国后,对“五四”以来新诗的评价问题展开的多次讨论更加引起了毛的注意。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时,发表了自己对新诗的看法。他说: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

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号召大家搜集和创作新民歌:

“印了一些诗,尽是些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2]

随后在汉口会议期间他又提到民歌,说:“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3] 通过上面的几次讲话,毛泽东提出了自己蓄之已久对新诗发展道路的看法:他认为旧体诗太束缚人,新诗的发展应该既要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又要汲取民歌的营养,从而创造出既反映时代精神,又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内容上和风格上均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新诗,也就是新民歌。

在新民歌这一运动提出的进程中,毛泽东本人的文化观念也是不容忽视的。他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主体。经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极度不信任使他提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4] 的命题。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战略目标:在“卑贱者”(即他所说的“小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中重新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一贯钟情于民歌的毛泽东显然认为民歌是最能让他所说的“卑贱者”广泛参与,并充分显示其创造力以至改造整个文学艺术的文学形式。

二、各党政部门与文艺部门的紧密配合

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党内最高领导人在发出“提倡新民歌”口号的同时,已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掌控了整个运动的发生、发展,甚至消亡的整个过程。所以,消息一经发出,便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一片轰动。1958年4月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云南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县委发出的《立即组织收集民歌》通知。4月14日,以社论形式发表了《大规模收集民歌》的倡议:“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湖北日报》也(下转第218页)

[收稿日期] 2007—03—02

[作者简介] 李丽琴(1982—),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言诗所处的情况是不同的，所以有的六言在文章中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单独看却并不上诗。因此，文章中的六言的状况虽然可以作为分析六言发展的参考，但是并不能完全以其作为六言诗发展阶段的例子。综上所述，六言在文中兴盛，六言诗却不兴盛是他们的音乐属性不同造成的，前者作为部分存在，后者作为整体存在。

三、从平衡美的原则谈六言诗

以下分析基于一个还无法论证对错的对美的认识：

平衡是自然之道。事物如果具有平衡的美，事物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稳定的小世界，受众会更关注它的内部，文字作品追求的多是这种境界，它引导人的指向是向内的，是以局部全息整体。事物如果具有不平衡的美，我们会自觉地向外界寻找平衡而把这事物与外界合为一体，比如书法、雕塑等追求的多是这种境界，它们引导人的指向是向外的，是以局部提示整体。小世界与大世界是相对的，当我们把文章或诗词本身作为一个独立世界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关注内部的平衡美。文学的这种平衡，不仅表现在形式本身，也表现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要取得平衡美，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在给人的刺激的强度上就应该是互相消长的关系。内

容上的刺激强烈了，形式上的刺激就要减弱，相反亦然，这样整体上才能平衡。

六言的整齐句式在形式上对人的心理刺激相对很小，如果要保持平衡美，便要加强语义的浓重，可这样便失去了诗在内涵上内敛轻逸的特质，作为诗就显得不纯。所以六言诗佳作很少，即使是佳作也无法与五七言中的佳作相抗衡。这样看来，六言诗的不景气几乎是必然的。相比较而言，六言诗在形式要求不很严格的情况下更容易展现诗美。虚词的运用，减弱对仗，交叉运用节奏点不同的诗句而不严格遵守两字一顿的规矩等可作为手段。在风格上也应以质朴粗放为主，不应追求纤细隐晦。但这样一来，六言诗看来便更接近词曲而不像我们通常所见的诗。这会使其个性有失鲜明，没有鲜明个性就很容易被其他形态所吸收，而使其本身很难兴盛。

但是虽然这样，六言诗仍然有其价值，它在创作中所做的探索不仅为其他文学样式提供了经验，也因其一直不受很大重视而区别于其他诗体，保存了相当大的自由，为成熟后的诗世界常保赤子之心。◇

[责任编辑：正元]

(上接第216页)发表社论《开展一个收集民歌为主的采风运动》。以后，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县党委宣传部纷纷发出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强调收集新民歌、创作新民歌是“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

此外，文艺部门也相当活跃，给予新民歌运动大肆的褒扬。1958年4月26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邀请首都文艺界著名人士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举行民歌座谈会，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号召文艺部门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1958年7月，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创刊号上，引人注目地发表了周扬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文章中，他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阐明了党对搜集民歌和其他民间文学的方针政策。强调了民歌“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最后展望：“群众诗歌创作将日益发达和繁荣，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会源源不断出现。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这样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的。”在发言中他引用了10首“大跃进”民歌，并且把让人编选的110首“大跃进”民歌，汇成《新民歌百首》，作为发言的附件印发与会代表。此次发言获得了毛泽东的首肯。

三、文艺家、诗人、群众的集体创作

新民歌运动不仅体现在采集和理论的倡导上，在创作上更是全民响应，一片繁荣。“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一些地方的墙上、门上、山岩上、树干上、电线杆上、商店柜台上、酒桶上、磨盘上，都作有诗和画。并开展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形式如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联唱会、田头赛诗会、战擂台、诗街会、诗人之家等等。人们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四川省叙永山区有一个7口之家，除了一个失明的老母和两个二三岁的孩子外，全都写诗，1958年10月以前，一家就写诗3500多首。即使是出门旅行，也不忘创作。1958年11月，上海铁路列车段的乘务员做了一个有趣的统计，从3月起到10月底，旅客们在“意见簿”上写下的诗歌就有5300多首。

文艺界也是一片狂欢。文坛泰斗郭沫若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共同编选的《红旗歌谣》，在当时影响之大。如果说新民歌“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那么《红旗歌谣》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诗经”。“在他们面前，连诗三百篇也要显的逊色了。”诗人贺敬之热情预言：“大跃进”民歌的出现，及它在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看到“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揭幕了。”著名诗人田汉也写了一组民歌体的《钢铁颂》。还有一些曾因写了些不符和当时艺术规范的诗歌而受到批判的知识分子，如蔡其矫，在新民歌开展以后，一改往日的“洋腔”，也唱起了民歌。

另外，在劳改农场里，著名作家聂绀弩在《散宜生诗·自序》中记录了当时“队员”们写诗的情况并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作诗的情景：整日田间力已疲，下工回屋事新奇。解衣磅礴床头坐，万烛齐明共写诗。人物风流最此时，江山至美古无之，社会主义歌难尽，一夜须吟万首诗。

至此，在毛泽东的提倡和推动、各党政部门和文艺部门的双重配合下，新民歌运动在全民响应的一片呼声中已发展成为了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群众文学运动。◇

注释

- [1]《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101
- [2][3]转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M].人民出版社，1997,448
- [4]见《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36

参考文献

-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2 史竞男.《喧嚣躁动下的寂寥——关于〈新民歌运动〉》.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 3 谢保杰.《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历史描述》.《文学史研究》
- 4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李丹]